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 經濟轉型及其內在原因

• 鄭會欣

關於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以往學者多偏重於政治結構的討論，卻不大注意社會、經濟層面的研究。實際上，辛亥革命後正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型經濟向近代化工業型經濟過渡的重要階段。大量數據表明，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發生重大轉型，這就是眾多學者所稱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經濟發生重大轉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得到反映。

一 近代機器化工業的發展

中國的近代工業始於鴉片戰爭爆發後，早期工業多屬於外國資本和國家資本所有。然而到了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近代工業除了在數量上大幅上升外^①，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民營企業的比例不斷擴大。

中國近代化工廠的成長 (1895-1920)

	1895年前	1913年前	1920年前
工廠數	108 (其中官辦31)	698	1,759
資本(千元)	182,603 (其中官辦175,312)	330,824	500,620

說明：本表所列工廠不包括外資在華投資企業，其中1895年前含官辦與商辦兩大部分，1913與1920年雖未加區分，但應以商辦企業為主。

資料來源：根據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54-56表改製。

關於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以往學者多偏重於政治結構的討論，卻不大注意社會、經濟層面的研究。實際上，大量數據表明，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發生重大轉型，這就是眾多學者所稱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

* 本文為提交「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學術討論會」（2001年10月，台北）論文縮寫本，全文將刊於稍後出版之會議論文集。蒙主辦單位同意刊登，謹致謝忱。

中國近代工業轉型的另一個明顯趨勢就是投資規模相對集中，以1912-20年的投資情形來看，資本在五萬元以下的工廠數目有所下跌，5-20萬元規模的工廠則基本維持不變，而20萬元以上投資規模的工廠卻顯著上升(以廠家數目計算，1922年資本在20-50萬元的工廠增加了67%，50-100萬元增加了175%，100萬元以上的則增加了128%)^②。

近代中國民族工業規模最大的應是輕工業，其中又以棉紡織工業的發展速度最快，因此棉紡織業的發展情形便可視為中國近代化工業的一個縮影。據統計，1912-27年全國共新設立華資棉紡廠86家，創設資本136,703,000元；而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全國僅設立華資紗廠24家，資本亦僅有18,630,000元^③。若以個別企業盈利計算，效果更為明顯。如上海申新一廠的利潤率1916年開辦時為9.5%，短短三年就上升到131%，1920年利潤總額更高達1,276,000餘元，相當於創業資本的四倍^④。而南通大生紗廠的第一和第二兩廠1914-21年的平均利潤都能維持在40%以上，其中1919年兩個廠的利潤都超過了100%^⑤。這一切都充分反映出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代的繁榮特徵。

二 近代金融業的興起

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出現要比中國近代工業落後大約30年，但是以辛亥革命為起點，中國銀行業開始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局面。1897-1911年間中國開設的銀行共17家，而民國元年(1912)僅一年期間全國新開設的銀行就陡然增加了14家^⑥。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銀行首先在原大清銀行舊址宣告成立，並正式對外營業。除了各省官銀錢號相繼改組為省立銀行外，大批民營銀行也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如在民國金融史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北四行」——鹽業銀行(1914)、金城銀行(1917)、大陸銀行(1919)和中南銀行(1921)，「南三行」中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5)以及勢力遍及西南各省的聚興誠銀行(1915)大都是這一時期先後成立的。

若以銀行的數量和資本來說，1897-1920年中國銀行業呈上升的趨勢，特別是1912年以後的變化更為明顯，其中銀行家數由1912年的37家增加為1920年的97家，實收資本亦由1912年的27,122,000元上升到1920年的87,829,000元，增長幅度超過兩倍以上^⑦。若以銀行的儲蓄存款計算，其間的增長也是非常明顯的，據統計，1911年上海所有華商銀行的存款總共還不到一億元，而到了1921年，上海一些重要銀行的存款總額已接近五億元^⑧。

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出現要比中國近代工業落後大約30年，但是以辛亥革命為起點，中國銀行業開始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局面。銀行家數由1912年的37家增加為1920年的97家，實收資本增長幅度超過兩倍以上。據統計，1911年上海所有華商銀行的存款總共還不到一億元，而到了1921年，上海一些重要銀行的存款總額已接近五億元。

三 對外貿易與商業的發展

如同中國近代工業的出現一樣，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也是開始於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但是中國納入世界體系是在列強的武力威逼之下被迫進行的，由於

貿易雙方所處的地位不同，各自的經濟實力又存在着巨大差異，因此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從一開始就具有極為明顯的不平等性，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長期以來貿易入超的不斷擴大。辛亥革命之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這一狀況稍有改善，這也往往被認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⑨。

從進出口貿易總的趨勢來看，1923年較1912年的貿易總額上升了將近一倍，其中出口數額上升的幅度略高於進口。另一個明顯特徵就是，自1915-19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額大幅下跌，尤其是1919年進出口數額幾乎持平^⑩。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不但在數量上大幅上升，而且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例也有所增加，由1914年的1.5%增加到1920-29年的2.4%，佔國民生產總值的7.3%^⑪。毫無疑問，這種狀況正反映出中國經濟轉型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以近代工業為依託，新式商業也在崛起，並逐漸取代了傳統商業的主導地位。新式商業首先出現於沿海、沿江的一些大中城市，民國初年在廣州、上海、天津、青島、武漢等地相繼出現了一批新型的、規模較大的百貨商店，它們經營的範圍已不限於傳統的商品，而主要以工業品為主。大型百貨公司的成立是商業競爭的結果，它反過來又促進了商業競爭的深化，同時也標誌着中國商業的近代化發展已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四 人口的遷移趨勢與城市化的發展

社會經濟狀況是一個國家人口變動的基礎，而人口的數量增減、素質高低以及遷移分布，又反過來對國家的生產、消費與積累產生深遠影響。從民國初年中國人口的遷移和流向趨勢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經濟正處於轉型之中。在此期間，產業工人的數目不斷上升，有學者統計，1894年中國的產業工人總數約為九萬餘人，1913年上升到50-60萬人，到了1920年初，更增加到260萬左右^⑫。

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國內統一市場經濟的擴大，由此而產生了許多新興的商埠，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幾個較大的商業經濟區域，因此民國初年也成為近代中國人口城市化發展較為迅速的一個時期，城鎮人口約從1912年的2,700萬增至1928年的4,100萬，16年間城鎮人口增加了1,400餘萬，相當於晚清70年所增加的城鎮人口總數；同時，城鎮人口佔全國人口比例也從1912年的7.6%上升到1928年的8.9%。與此同時，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全國出現了四五個人口超過百萬以上的大城市，其中上海人口超過260萬，成為遠東最大城市^⑬。

人口城市化的趨勢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是同步進行，也是相輔相成的。可以這麼說，中國的近代化需要人口向城市、特別是向大都市聚集，而人口的城市化又反過來刺激了城市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這也成為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重要標誌。

民國初年中國人口城市化發展迅速，城鎮人口約從1912年的2,700萬增至1928年的4,100萬，相當於晚清70年所增加的城鎮人口總數。可以這麼說，中國的近代化需要人口向城市、特別是向大都市聚集，而人口的城市化又反過來刺激了城市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這成為中國近代經濟轉型的重要標誌。

五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發生了重大轉型，國內外學者常將這一階段形容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學術界對於這一現象的出現似乎並無異議，甚至對其產生的原因都有共識。以往的學者多以為，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列強紛紛捲入戰爭，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包括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中國民族工業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發展實業；一旦戰爭結束，列強立即捲土重來，重新佔領中國市場，所謂「黃金時代」也就曇花一現，一去不復返了。這一結論雖然不無道理，但畢竟都是些外在因素。那麼，導致中國經濟出現轉型有沒有內部原因呢？它們又與辛亥革命的發生有無關係呢？這些問題實在是值得認真反思和深入分析的。

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人們帶來的重大影響首先就是觀念以及意識上的轉變。二十世紀初、特別是辛亥革命爆發後，由於政府的提倡，現實的需要，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如對於「義」與「利」的價值判斷、對於職業的取向追求等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不再死守儒家「重義輕利」、「崇義抑利」的傳統信條，而旗幟鮮明地為「利」正名，認為「趨利」乃大勢所趨，同時它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職業取向變化的顯著特徵，就是重商主義的確立以及職業平等的趨勢。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以及商人在經商活動中所取得的高額利潤，又極大地刺激了大批士紳的投資意欲，因而越來越多的士紳由以往在鄉間購田置房而改向到都市投資經營近代的工商業和金融業，甚至連那些軍閥、官僚也都由以往投資土地等傳統經濟項目，轉向投資近代的金融與企業^⑨。這一事實說明，辛亥革命的成功強烈地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創辦實業、發展經濟的熱情，而這一良性互動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在由傳統的經濟形態向近代化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政府的行為與態度對於制度的變化以及國家工業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晚清新政雖然是清王朝滅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但是它首先在政府的職能部門中設置商部（後改為農工商部），並公布一系列獎勵工商的法令，這對推動中國民族企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它承前啟後，開拓民智，特別是它所制訂和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次以近代國家憲法的形式宣布「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這不但激發了人民的愛國情操，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提供了法律保障。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雖然在政治上鎮壓革命黨，實行獨裁統治，但在經濟上卻還是鼓勵發展資本主義、推行「振商」、「保商」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張謇於農商總長任內更制訂和頒布了大量法令^⑩。據初步統計，自1912-23年北京政府共頒布有關經濟方面法規76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15年以後頒布的^⑪。所有這一切自然都有利於鼓勵和推動國內工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在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同時，還應注意到隨着西方列強經濟入侵與商品傾銷的不斷加劇，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亦日益高漲。進入民國後，抵制外貨、提倡國貨的運動更是方興未艾，興辦實業亦蔚然成風。

辛亥革命後，在政府提倡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不再死守儒家「重義輕利」、「崇義抑利」的傳統信條，而旗幟鮮明地為「利」正名；而職業取向變化的顯著特徵，就是重商主義的確立以及職業平等的趨勢。這說明，辛亥革命的成功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創辦實業、發展經濟的熱情，這一良性互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

在國貨運動蓬勃發展期間，剛剛成立的共和政府也採取種種方式，予以積極配合。1912年11月，工商部召開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其宗旨即為「謀工商礦業改良發達，欲集全國實業家及專門學者之意見」，實為「中國工商界數千年來未有之盛舉」^⑦。1914年12月5日，農商部向各省發出飭文，指出歐戰「未始非工商發達之轉機，凡各省種種實業，俱應切實整頓，所有大小工廠悉予竭力維持，一面趁外貨入口稀少之時，改良土貨，仿照外貨」，並公布《維持工廠辦法大綱七條》，責令各地方長官在抵押貸款、產品改良、運輸費、拓展銷路諸方面提供援助。1917年8月，農商部又通令各地，「嗣後所有公共機關日用消耗各品，除特種無國貨可代用者外，務請專購國貨，以示提倡」^⑧。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門還開辦國貨展覽會，並組織各省企業參加國際性的博覽會，這些舉措均有助於推動中國國內企業外向型發展。

1912年11月，工商部召開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其宗旨即為「謀工商礦業改良發達，欲集全國實業家及專門學者之意見」，實為「中國工商界數千年來未有之盛舉」。隨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他們甚至敢於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說「不」，參政議政的意識也日益強烈。他們不再逆來順受，欲與統治者談判，要在政治舞台上佔據一個席位了。

民國初年，特別是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軍閥混戰，中央集權相對削弱，但這對於各地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是因為中央不得不減少對地方的束縛，對地方亦無法進行有效的干預。雖然長年以來的軍閥混戰對於內地的經濟曾造成某種程度的破壞，但一般來講，中國的主要城市特別是上海、天津、廣州、青島等通商口岸並未受到戰禍的直接影響，反倒獲得地方政權的保護，從而形成了內地的游資向都市集中的這一趨勢。海關的十年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分析上海工業發展的原因時海關報告認為，由於「內地動亂不寧，那裏的工廠經常遭到騷擾，這就形成了工業集中於上海的趨勢。許多本應遷出或開設在原料產地的工廠也都在滬設廠，雖然運費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別在租界內，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擾」^⑨。也正是由於中央集權的式微，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開始壯大，他們甚至敢於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說「不」，這充分顯示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壯大，參政議政的意識也日益強烈。他們不再逆來順受，而欲與統治者進行談判，要在政治舞台上佔據一個席位了。

歐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得以發展亦與中華民國成立後投資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諸如鐵路交通的開闢、國內商品市場的擴大、新式教育的興起及普及，以及隨之而引起的科學技術的傳播、先進管理知識的運用、以銀行為代表的近代化金融機構與市場的建立等等，都標誌着國內的投資環境已發生重大轉變，以致吸引內資與外資不斷投入中國的資本市場。

上述原因實際上彼此間都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很難分清哪個原因是主要的、哪個是次要的，但若將它們結合在一起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都是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再從中國工商業和金融業發展的整體趨勢上來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辛亥革命之後就開始顯著發展起來，並不是隨着歐戰的爆發而產生；同時，這個所謂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也並非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束而完全消失。因此筆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確實為形成中國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帶來重大的契機，但是若要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原因，還必須從中國內部的深層結構去分析和研究。

註釋

- ① 陳真、姚洛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10。
- ② 參見龔駿編：《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109-20。
- ③ 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109。
- ④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58、84。
- ⑤ 《大生系統企業史》編寫組編：《大生系統企業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126-29。
- ⑥ 沈雷春主編：《中國金融年鑒》（上海：中國金融年鑒社，1939），頁105。據最近的研究所得，1897-1911年中國共設立本國銀行30家，而1912年一年設立的本國銀行就高達24家。見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頁159。
- ⑦ 參見《學術月刊》（上海），1981年第5期，頁39。
- ⑧ 洪葭管、張繼鳳：《近代上海金融市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16。
- ⑨ 有關民國初年海關進出口貿易的統計可參閱國民政府主計部編：〈民國以來海關進出口貿易淨值〉（1948年6月），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626-27。
- ⑩ 有關這一時期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可參閱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史實的綜合分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頁34-44。
- ⑪ 楊端六：《最近六十五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931），頁32-33，轉引自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社會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頁163。
- ⑫ 參見劉明達：《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頁87-122。
- ⑬ 參見黃逸平、虞寶棠主編：《北洋政府時期經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頁325。
- ⑭ 有學者統計，北京政府時期有45名軍閥、官僚投資於119家實業和企業（不包括金融和商業）。參見魏明：〈論北洋軍閥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⑮ 有學者曾對此進行詳盡的資料收集，見沈家五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 ⑯ 參見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1533-35。
- ⑰ 轉引自潘君祥主編：《近代中國國貨運動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9-10。
- ⑱ 轉引自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中冊，頁1547。
- ⑲ 轉引自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278。

鄭會欣 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改革與困擾》、《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並發表有關民國史學術論文多篇。